红色收藏

陈列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展厅里的冀南银行行徽

马背上的银行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枚珍贵的冀南银行行徽。行徽长3.3厘米、宽3厘米，外形呈盾形，中间为孔雀蓝填色，它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铭记着冀南银行的历史功绩，见证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金融贸易的繁荣。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我省黎城县小寨村成立。在日寇的频繁“扫荡”中，冀南银行职工常常是一手拿枪、一手持账，一旦遭遇日军突袭，就立刻将冀钞驮在马背上迅速转移，因此，冀南银行又被称为“马背上的银行”。

冀南银行的首任行长是高捷成，于1943年5月14日牺牲于河北内邱县白鹿角村。那天，高捷成一行人出行途中突然下起了小雨，他们只好在当地宿营。由于汉奸告密，敌人从几十里外奔袭而来。高捷成带领队伍向村外突围时，被一颗子弹击中腰部，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让电话员周正云带上文件先行突围。无奈之下，电话员只好背起挎包，向山上狂奔。顷刻间，敌人将高捷成团团围住，扯着他的衣服胡乱翻捡，妄图从一位行长身上搜刮到他们渴望的金银财宝，却一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朝他连开数枪。高捷成牺牲时年仅34岁，他的一生，没有传奇，也不曾惊天动地，但他在紧要关头，把生的希望和党的秘密文件交给战友。

作为手握经济大权的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牺牲后，给家人留下了他为支援红军借下的2万元欠款和一封饱含报国之志的红色家书。信中说：“我历尽一切千辛万苦，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两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

高行长牺牲后，家中妻子历经艰辛，还清了他欠下的债务，帮他兑现了信中的承诺。她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将政府发的3000元烈士抚恤金全部捐献给国家。

这枚冀南银行行徽，见证了冀南银行的革命先烈们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铸起的中国金融不朽的丰碑！

山西省博物馆协会供稿

晋祠三大名匾

蔺福平

晋祠博物馆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25公里处的悬瓮山下，它背靠悬瓮山，前临晋水，山环水绕，现存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各式建筑100余座，古树名木96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树30株，宋元以来塑像194尊，诗文碑刻440余通，这里绿树成荫，建筑成群，是宗祠祭祀建筑与自然山水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罕见的瑰宝。它是一座集山水园林、古建雕塑、诗文碑刻、古树名木、楹联匾额及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收藏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类博物馆。

在众多晋祠历史文化遗产中最享有声誉的便是晋祠博物馆的“三绝”“三宝”“三匾”，它们是孤例，是奇迹，是瑰宝。

“以匾研史，可以佐旺；以匾研诗，可得诗眼；以匾学书，可得笔髓。”今天就让我们在晋祠的三大名匾中感受晋祠千年的文化传承。

“水镜台”匾位于水镜台正额上。晋祠入大门，正对的一座建筑，叫作水镜台，是一座坐东朝西的古戏台。

“水镜”之名取自《汉书》名句“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寓意为人世间的善恶忠奸尽人皆知。此匾由清乾隆翰林、名书法家、太原县晋祠旁边的南堡村人杨二酉所题，书体清秀，笔力遒劲，被誉为“秀丽之笔”，为晋祠三大名匾之一。

“难老”匾位于晋祠圣母殿一侧难老泉亭，长1.45米、宽0.7米。此匾由傅山所题，是晋祠第一名匾，被誉为三大名匾中的“神奇之笔”。“难老”二字出自《诗经》中“永锡难老”（“锡”同“赐”），意味生生不息，青春永驻，其用笔苍劲洗炼，颇具神韵。傅山，山西太原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医学家、书画家，在诗文书画等方面，傅山皆造诣颇深，有“清初第一书家”之誉。傅山先生晚年曾在晋祠云陶洞隐居一段时间，常与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友人密切交往，吟词作画，煮茶品茗，无不留下翠痕、笔迹。

“对越”匾位于在晋祠的中轴线对越坊上，“对越”二字，出自《诗经·周颂·清庙》中：“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对”为报答，“越”为宣扬，意为报答宣扬祖先的高尚功德。“对越”匾相传由太原县举人、书法家高应元所书，“对越”二字为榜书金字，笔力遒劲，气势磅礴，宛如山岳嵯峨，棱角俏丽，被誉为“雄奇之笔”，同样为晋祠三大名匾之一。

因此在书法界评说，杨二酉写的“水镜台”是秀丽之笔，傅山写的“难老”是神奇之笔，高应元写的“对越”是雄奇之笔。

晋祠建筑跨越千年，留下历史的痕迹，这些痕迹散落在匾额楹联之上，反映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俗民风，起着补史正史的作用。匾额作为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载体，是具有代表性的实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人类建筑艺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文物里的年年有“鱼”

鱼是我们远古祖先的图腾之一，在我国最早出现的象形纹饰中，数量最多、最典型的便是鱼纹。随着历史发展，鱼形纹饰逐渐由氏族崇拜演化为祈求富裕、爱情、幸福的吉祥符号，广泛受到人们的珍爱。因“鱼”与“余”谐音，受传统文化中文字谐音修辞的影响，古代瓷器工匠把鱼和各种寓意吉祥的纹饰组合运用在瓷器上，禳灾避祸、祈福吉祥。这种“鱼”文化表现手法，可让人感受到“鱼”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丰富内涵。

五彩鱼纹折腰碗

明清鱼纹瓷器常以组合图案的形式出现，它是利用谐音的表达手法赋予画面一种吉祥喜庆的寓意，这与明清时代“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文化氛围有关。此种艺术表达手法，主要是受传统文化中文字谐音修辞的影响，它鲜明典型的把所谐之音点落在瓷器组合纹饰的吉祥本意上，使人自然地联想到一句吉祥语。因“鱼”与“余”谐音，寓意吉祥、富裕的“有余图”。折腰碗始见于唐代，流行于元代，因碗壁曲折似弯腰而得名。通体采用五彩装饰，绘有鱼纹图案。这种纹饰早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已出现，其后的商周青铜器、玉器，秦汉的漆器、彩陶上，鱼纹均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代，此纹开始用于瓷器装饰。宋代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耀州窑、磁州窑都有大量的鱼纹装饰。明清之际，景德镇御窑生产的鱼纹瓷种类繁多，最为引人注目。鱼的吉祥之意汉代就有显示，人们认为鱼象征多产，食鱼可去疾不老，又可乘鱼升仙，金鱼能禳灾避祸。明清以来，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表现成为新的时尚，鱼以及鱼与其他事物的象征建构，不仅表现着对人口繁衍的祝福，而且更多地趋向对农作、物产、年运丰足的祈盼。

粉彩鲤鱼跃龙门图盆

鲤鱼跃龙门是明清瓷器中的一种传统寓意纹样，它一般以鲤鱼、龙、波涛组成。辛氏《三秦记》记载，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聚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也，不上者点额暴腮。这就是鲤鱼跃龙门的传说。龙门，在山西河津和陕西韩城之间，跨黄河两岸，形如门阙，这里交通不便，水险浪高，一般的鱼鳖之类游不上去，而能跃过龙门的鱼就变成龙了。人们后来用它比喻金榜题名，寓意高升昌盛，表达了他们祈求升官登仕的美好愿望。明清瓷器尤其是清代瓷器中这一题材比较常见，它是象征吉祥的装饰纹样之一。

清雍正釉里红三鱼纹高足碗

宋代以后，鱼纹题材广泛地运用于瓷器装饰上。除了单独的鱼之外，还有与莲花、莲叶组成的莲池游鱼纹饰，与水藻相配的鱼藻纹。由于鱼与有余的“余”谐音，所以鱼也象征富足、富裕。在清代，瓷器上也有鱼纹和蝙蝠、乐器磬、兵器戟、盘肠、“卍”、钱等组成的“连年有余”“吉庆有余”“富贵有余”等吉祥纹饰。清雍正釉里红三鱼纹高足瓷碗釉里红是以氧化铜作着色剂，于胎上绘画纹饰，后罩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制而成，因红色花纹在釉下，故称“釉里红”。釉里红为元代中期景德镇窑的重要发明之一，明代宣德时期烧制极为成功，形成鲜艳的宝石般红色，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烧制的“釉里红三鱼高足瓷碗”等，也是精品。

明琉璃鱼耳炉

明琉璃鱼耳炉敞口，阔颈，鼓腹，圈底，下承三兽足。炉身两侧附鱼形耳。外壁及耳以黄、绿、蓝三颜色琉璃釉进行装饰，古朴庄重。

鱼纹图案作为中国陶瓷最古老而又延续时间最长的装饰纹样之一，正是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纯正表现。“辟邪求吉纳福心理是一种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它是民间群体共同强烈的情感需求，所以重视艺术与人的生命功利的价值，强调合于意的幸福感受，是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思想。明清两代，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得这种带有功利性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思想强化。民众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观念更多地关注到切身利益和功利需求上来，人们对物质或精神功利性需要的满足程度成为最重要的审美理想和标准。由此可知，明清瓷器上大量出现赋予吉祥意义的鱼纹图案“不仅反映了吉祥文化的鼎盛和普及，同时也反映出封建社会末期社会世俗化的功利价值观”。

太原市博物馆供稿

金灯寺石窟

单 陉

山西平顺明代金灯寺石窟群是中国石窟建筑史上年代明确的最后一座石窟群，是中国石窟雕像艺术即将谢幕之际的经典，被称为中国石窟造像尾声中的巅峰之作。

金灯寺石窟开凿于平顺县玉峡关乡背泉村东、太行山700米深处的一个山巅自然形成的石凹内，从其险峻的地理位置，可以想象得到建造难度有多大：从明弘治十七年（1504）起，至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止，历时60余年，就崖开凿石窟25个，依崖雕造出石佛万余尊。现今遗存的200多尊佛、菩萨、金刚、天王、罗汉以及佛教人物造像，形体秀美，装饰富丽，承唐、宋圆润风格之遗风，独具明代俊俏娴静的特色，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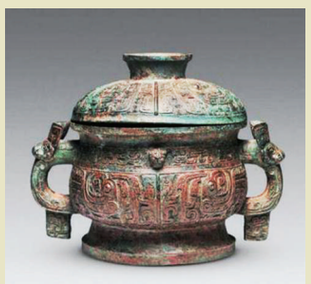
严格意义上来说，金灯寺并不是一个佛寺，里面供奉的有佛、道、儒、神等诸多神像，是典型的前道后佛。金灯寺依山势由东而西共有七个院落，各院均有殿堂，自成一体，其中最大最著名的是水陆殿，又名水罗殿。

水陆殿于明弘治元年（1488）凿造，坐北向南，外檐雕凿方形檐柱，中辟长方形窟门。殿前立有几通石碑，因字迹风化，难以辨认。拾级而上进入洞窟，可以看出它的面积约有20余平方米，上置平顶天花，雕方形藻井，下为清莹的池水，为常年从西北角石隙中涌出汇集而成。池上凿有田字形石桥，沿着这座石桥可到殿内各处。殿正中间为高出水面约60厘米的长方形佛台，佛台中央有扇面墙，三尊高约3米的佛像结跏趺座于莲花宝座上，佛体匀称，神态慈祥，背面倒座三大士像，扇面墙后亦并坐三佛，由于布局灵活，使殿内佛像多而不乱。前槽为八角形金柱两根，柱身正面雕龙形图案，其他几面雕花卉。左右壁上部各有佛龛9个，内雕十八罗汉，造型各异，形神兼备。左、右、后三壁下部有90幅浮雕壁画，刻画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佛教人物，讲述了一个个优美动听的佛教故事，好似一本精美的立体连环画。

图片来源：百度

我省一西周墓葬推测为国君级别

胡 健



簋（M2022:195）

盘（M2022:194）

觚（M2022:190）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1月4日对外发布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022墓考古发掘资料，考古人员根据墓葬规模、随葬器物规格等墓葬属性，推测该墓主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应是西周时期一座国君级别墓葬。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于2004年被盗时发现，2004年至200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和绛县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地保存较完整，墓地共分三个发掘区，共发掘西周时期墓葬1299座，发现车马坑33座。

此次公布考古资料的墓葬为M2022墓，墓内随葬器物种类丰富，数量较多，包括青铜器1045件（套）、玉器60件（套），其中青铜礼、乐器16件，且发现殉人和殉狗，显示墓主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据考古发掘项目领队宋建忠介绍，墓内随葬6件兵器，推测墓主性别为男性，且随葬青铜器铭文有两篇记载跟周王有关。根据墓葬规模、随葬器物规格及带殉人和殉狗等墓葬属性，推测其应是一座国君级别墓葬。